

W Y Z C L G

文艺政策论纲

魏天祥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央党校学术著作
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文艺政策论纲

魏天祥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京)新登字100号

文艺政策论纲

魏天祥 著

责任编辑：沈丹英

封面设计：李贺然

责任校对：李焕婷

版式设计：冯 力

出版发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地址：北京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编：100091 电话：258.2931 258.1868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

版次：1993年 5 月第 1 版

字数：250 千字

印次：1993年 5 月第 1 次

印张：9.75

印数：1—3000 册

书号：ISBN 7-5035 0695-4/I·8

定价：5.90 元

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一、文艺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1)
二、为什么要制定文艺政策.....	(3)
三、文艺政策与政治路线.....	(9)
四、文艺政策与哲学原理.....	(13)
五、文艺政策与文艺观念.....	(17)
六、文艺政策与文艺领导.....	(20)
第一章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24)
一、“二为”的基本内涵与要求.....	(24)
二、工农兵方向的形成和历史功绩.....	(30)
三、新经验的逐步积累与“二为”的提出.....	(38)
四、“二为”在执行中的主要经验和问题.....	(46)
第二章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55)
一、“双百”方针的最初内涵和后来的发展.....	(55)
二、“双百”方针提出的理论依据、历史原因和社会条件.....	(63)
三、“双百”方针与“创作自由”	(70)
四、“双百”方针在执行中的经验和问题.....	(77)
第三章 “二为”和“双百”的关系与协调.....	(87)
一、“二为”和“双百”的关系.....	(87)
二、从“二为”和“双百”看文艺政策的规范性与开发性.....	(91)
三、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	(95)
第四章 体现文艺方向和基本方针的具体政策.....	(104)

一、“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104)
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107)
三、内容和形式统一、思想性和艺术性并重	(111)
四、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专业与业余并重	(116)
五、表现社会主义时代、与人民群众相结合	(119)
六、提倡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	(122)
七、把社会效益作为最高标准	(124)
八、发展多样化、突出主旋律	(127)
九、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	(128)
十、实行文化开放和中外文化交流	(130)
第五章 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133)
一、文艺工作为什么需要党的领导	(133)
二、党领导文艺的宗旨和原则	(139)
三、党领导文艺的作风和方法	(145)
四、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	(153)
第六章 党的领导与文艺批评	(161)
一、文艺批评是党领导文艺的重要手段	(161)
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	(167)
三、文艺批评中的政策思想	(174)
四、党的领导与文艺评奖	(181)
第七章 党的领导与文艺规律	(184)
一、尊重文艺规律是领导文艺的必要条件	(184)
二、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规律	(191)
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和特征	(197)
第八章 文艺体制改革	(204)
一、文艺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204)
二、文艺体制改革的宗旨、原则和内容	(208)
三、文艺体制改革的几个主要方面	(213)
四、进一步深化文艺体制改革	(223)

第九章 文化经济政策的目的和内涵	(226)
一、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226)
二、制定文化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231)
三、文化经济政策的基本内涵	(235)
第十章 文化法规建设	(242)
一、文化法规与两种价值、两种效益的关系	(242)
二、制定文化法规的现实性和必要性	(245)
三、我国文化法规的建设现状	(249)
第十一章 文化市场的建立和完善	(256)
一、文化市场的确立和发展	(256)
二、文化市场发展中的问题	(261)
三、文化市场的发展方向与管理机制	(269)
第十二章 反淫秽法规与淫秽色情出版物的识别	(276)
一、淫秽出版物划分标准的必要性和我国反淫秽法规的建立	(276)
二、西方国家的反淫秽法规和中西反淫秽法规比较	(283)
三、反淫秽法规的历史制约性	(290)
四、淫秽色情出版物的识别	(295)
结束语	(300)
后 记	(303)

绪 论

一、文艺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文艺政策是—定阶级或政治集团、国家政权或执政党对文艺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国家和政党管理意志在文艺工作中的反映，同时也是—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

文艺政策与文化政策是子系统与母系统的关系，文化政策比文艺政策具有更为宽广的统摄面。就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文艺政策与文化政策实际处于—身二任、重构兼出的状况。也就是说，文艺政策的主要部分，差不多也就是文化政策的基本内涵。而且，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政策。

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是党在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和解决文艺问题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形成和发展，与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文艺政策的形成，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在许多方面都得到展开。其中，文艺政策就是具体展开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我国文艺政策形成的标志。在这以前，虽然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都对文艺问题有过—些论述，但还未正式形成指导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只有《讲话》的发表，才对文艺的根本问题即文艺的方向问题——文艺为什么人和为什么样的社会理想服务以及如何为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系统的回答，并正式使用了“基本方针”这样的用语。

《讲话》指出，我们讨论问题，不是从定义出发，“而要

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这不仅告诉了我们讨论一般文艺问题的方法，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制定和发展文艺政策的基本方法。党的文艺政策的形成，一方面为我国文艺运动确定了根本的方向，另一方面，又为文艺政策自身的完善，指出了基本的原则。因此，我们在确认《讲话》是我国文艺政策源头的同时，在确认它所指示的根本方向不能更改的同时，又要看到它的内涵需要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为此，我们不必只是在今天的政策和过去的政策之间寻找共同点。事实上，今天的文艺政策已与《讲话》有许多不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面临的基本任务已发生了变化，对文艺客观规律的认识也更为深入，实际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也更多更新鲜。实际情况在发展，毛泽东思想在发展，文艺政策和文化政策也要随之而有所发展。

建国以后，文艺政策有两次大的发展。一是建国初期，尤其是1956年；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两次大发展都集中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文艺和解决文艺问题时的一切从文艺工作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精神。正因为党和国家不断注意对文艺政策的补充、调整、发展和完善，我们今天也才能有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文艺政策。

我国文艺政策的总体结构，可以分作三大类别：

第一类是总方针总政策，这就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大政策既是文艺工作在总体上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保证，也是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繁荣的基本保证，它们既反映了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反映了党和国家按照客观规律促进文艺发展的主观能动性。

第二类是体现“二为”和“双百”的各种具体方针。光有“二为”和“双百”还不行，还要有许多具体的方针去保证它们的实现。各种具体的方针，都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上，为“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实行提供一种具体保证的。这些

具体的方针分别产生于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实践经验的结晶。

第三类是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为了实现领导体制与管理手段科学化所采取的必要政策。这方面主要是指党领导文艺的宗旨、原则和方法，以及与此相关的文艺体制改革、文化经济政策和文化法规等。这方面的政策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

随着历史的发展进程，文艺政策当然还会有所发展。但文艺政策的总体结构，可以说已经基本形成。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已经有了基本的遵循。

在文艺政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新时期文艺政策的调整和发展，是一次历史性的跨越。它喻示着社会主义文艺政策从此步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次调整和发展的顺利实现，完全得力于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挫折和损失的沉重积累，促成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带来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后整个社会出现的无限生机与活力，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着人们思想的解放。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新时期的文艺政策，才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不仅形成了今天比较完备、系统的文艺政策，而且还对文艺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书在以后的各个章节中，将在全面、系统介绍我国各项文艺政策基本内涵与形成过程的同时，着力论述文艺政策在改革开放条件下的新发展和新走向；除了对政策在实行中的主要经验与存在问题作出必要的分析外，还将对商品经济条件下文艺政策所面临的各种课题进行多角度的探讨。

二、为什么要制定文艺政策

西方学者认为，从本世纪初以来，文化领域已发生了三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文化发展由自发状态，转而要求国家参与。国家不仅要国民的文化生活作出一定的安排，给予必要的引导，还要建立起相应的机构，制定相应的文化政策；第二次革命是随

着再现手段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人民大众真正获得了享受文化财富的权利，人与人之间的智力联系和精神联系，得到了空前的增强；第三次革命是国际间的文化合作。这是西方学者所说的三次文化革命。按这种说法，文化政策的制定，属于第一次文化革命。也就是说，国家通过制定政策，对文化活动进行干预，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但在此说提出后的十多年，我国一些人却还在怀疑制定文化政策的必要性。

前些年，我国曾有人提出，过去任何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文艺发展，并没有哪一个党来领导，也没有规定一个什么单独的文艺方针，文艺还是发展了，甚至出现了伟大的作品和伟大的作家；现在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党有政治纲领，国家有宪法，何必一定要单独规定一个文艺方针呢？这种看法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也不符合今天的生活实际。

首先，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基本的情况，就是无论是过去时代的统治阶级，还是现在的各种性质的执政党，都不是对文艺全然不管。从制定文化政策的角度说，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对文化的干预，事实上比上述西方学者所说的时间还要早。各个时代的统治者差不多都要根据自己的阶级利益和治国方略，制定出相应的文化政策。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不同之处在于：其政策有的完备，有的不完备；有的见诸文字，有的不见诸文字。也就是说，有的是彰明较著，有的是潜移默化。而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文艺的发展状况和总体面貌如何，也常常与统治阶级和执政党所奉行的文化政策密不可分。

比如，我国清代康、雍、乾时期的文艺政策尽管是不完备的，但都是潜移默运的。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说：“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消极的一方面是文字狱，积极的一方面如钦定四库全书，对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加以修改，成为定本。对于其他经史诗文

等，“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有苛论，但也有确评”；其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从中，不仅透出清朝统治者“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而且可以分明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①

我国宋代的绘画和清代的京剧之所以能在当时获得大生大长，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从统治阶级方面来说，采取有利于绘画和京剧发展的文化政策，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用美术为自己的生活服务，宋徽宗时不仅建立了专门培养艺术人才的皇家绘画学院，即“翰林图画院”，而且非常重视对历代宫廷艺术的研究和整理。科举式的艺术考试制度，从画院方面说，起到了广泛搜罗人才的作用，合格者进入画院，封官晋爵，不合格的回 家卖画；从绘画事业方面说，客观上为大量专业人才的涌现，提供了机遇，一大批享誉世界的大画家如范中立、郭熙、李公麟、米芾、张择端、李唐、马运等，正是在这种气候和条件下，才得以成长和发展。另外，由于注重对历代绘画的研究和整理，也才有可能在继承古人的基础上，有所创造，以致无论在花鸟画方面，还是在人物、山水画方面，都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手法上不仅开创了浓淡晕染法，而且在表现内容上突破了过去仅为万物“传神写照”的做法，开始用以物喻人的方式，表现作者的道德观念和政治主张，并且为讲求笔墨情趣、通过客观表现主观的“文人画”，奠定了走向成熟的基础。同样，京剧艺术之所以能成为“大戏”、“国剧”，能在二百年前由地方剧种进入北京，演化发展，在全国剧坛长期独领风骚，除了它本身善于吸收消化其它剧种之所长外，还得力于清代宫廷的重视和有力提倡。

我国学者张岱年、程宜山在《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中，列举出了中国封建时代文化专制政策的五大表现：其一是

^① 《鲁迅论文艺与艺术》下册第703—704页。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二是国家对儒家“道统说”的官方支持，凡与“道统说”不相吻合的儒家别派都受到冷落、排斥；其三是实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其四是文字狱；其五是文化上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些，都是无庸否认的事实。

其次，如果古代社会的文艺政策更多地表现为实做而非明言的话，那么到了现代和当代，许多国家早已是毫不掩饰自己的主张和目的了。以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其文艺政策多表现为设立奖金和提供资金的方式，以推动文学艺术的发展，使文艺为自己的一定目的服务。瑞典政府根据著名发明家和化学家诺贝尔遗嘱设立的诺贝尔文学奖金，从1901年起，每年把一枚金质奖章和一定数量的奖金，授予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最佳作品的人。诺贝尔的本意是要奖励“一年来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但什么才是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呢？奖金的执行者当然有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分明就体现了他们的文学主张和认为文艺所应具有的目的性。从1989年起，日本开始设立艺术天奖——“天皇奖”。1990年颁发的奖金高达10万美金，被人们称为“诺贝尔艺术奖”。日本美协执行主席日立公爵在谈到设立此奖的用意时说，目的是为了“参与国际间的合作、和平和谅解”。所谓“合作、和平和谅解”，表面上看起来是些中性词，很一般化，其实其内涵颇有深意，很有些日本特色。据1990年12月24日路透社报导，爱尔兰为艺术家提供的奖金居世界之冠。由贵族推荐产生的爱尔兰“贤人学会”，每年向各位艺术家提供1.1万美元的年薪，目的是使他们充分发挥其才能和创造力，以跻身国际舞台，为国增光。他们认为，在过去10年里，爱尔兰的艺术光彩，大大增强了它的民族骄傲。在法国，为了帮助不能靠版税生活的作家摆脱经济上的压力，专心写作，出版社是采用预支稿酬的方式每月给作家提供一笔资金，除此之外，凡达到一定水平的作家，还可以申请文学基金。这些做法无疑都是有利于文学创作发展的必要的经济措施。同样，美国也设立了国家、州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

集团四级文艺基金，目的是使文艺家从经济压力中摆脱出来，专心于创作。许多人以为美国是只讲市场法则，不讲政策的国家。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贝尔就曾说：“尽管（美国的）文化娱乐机构基本上是受文化市场支配的，而比较严肃的作品则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基金会赞助人的赞助。”英国则是采取政府对艺术事业拨款的方式，支撑艺术事业的发展。而且，他们对艺术与经济的关系有独特的理解。除政府拨款逐年增加外，同时还鼓励私人 and 工商团体向艺术事业投资。英国采取这些做法的目的，是为了让艺术成为经济发展的“助跳板”。据称，英国与艺术直接有关系的行业，总共解决了约50万人的就业问题，外汇收入在各行业中占第四位。商业界人士认为，“艺术的繁荣也会带来商业的繁荣”，如此等等。

中国也是以拨款方式体现对文艺事业支持的国家，而且尽可能每年有所增加。除了靠国家拨款外，一些艺术单位也在寻求企业单位对他们的资助。目前，在财政困难，拨款不可能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企业部门对文化事业的投资，把文化艺术的发展看作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助力，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经济政策。事实上，就世界范围来看，通过一定的文化经济政策，以调节本国的文化艺术生产，引导人们的文化艺术活动，体现国家的文化发展方针，早已经成为普遍采用的政策。

再其次，许多国家或政党、集团的文艺政策，一般都表现为通过一定的措施和手段，以达到提倡什么和禁止什么的目的，包括在国外竭力扩展本国的文化影响。许多国家都有非常具体的“文化扩张政策”，他们为了“国家利益”和所谓“国际团结”，常常通过对别的国家进行文化渗透，以实施自己的文化影响。一位西方国际问题专家曾说：“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关系政策中，考虑最多的是确保本国文化的传播，尽管越来越有必要首先考虑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和技术援助。”而其他国家为了对付文化大国的“扩张政策”，也并不甘心无偿接受外国文化。为了保持本国的

文化个性，他们也要制定相应的保护性政策。一些西方国家对外国电视节目在本国的播映，都有一定的限制措施，目的显然是为了扶持本国电视节目和颂扬自己的民族精神。据有关方面介绍，英国BBC广播公司播放本国电视节目一般都在85%以上。加拿大规定，引进外国的电视节目不得超过30%。日本为了保存具有民族特色的歌舞伎，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除了花重金在民间大量扶持歌舞伎、成立抢救协会外，还在中学生中举办专门学习班，利用暑假时间向他们介绍歌舞伎并组织表演。1979年我国派出规模宏大的中日友好之船访日代表团，所到之处，都有抢救协会成员为他们表演富于民族特色的文艺节目。1990年12月，日本松下电器产业公司一下子买下了美国好莱坞的环球影业公司和它的母公司美国音乐公司。在记者招待会上，美国记者问：如果环球公司今后想拍一部嘲笑日本人的电影，或是一部批评已故天皇的电影，松下会怎么样？松下发言人回答说：“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发生，电影公司应该拍摄鼓舞人心的和人人爱看的影片”。此话因有伤美国人的自尊心，后来松下权威人士又出面加以澄清，说什么松下无意干预环球的制片方针等等。^①很显然，松下发言人的第一次回答是松下集团乃至日本人制片方针的真实流露，第二次的澄清则是按照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所作的许诺。

即使在同一国度之内，不同的政党对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文化艺术作品所采取的封锁和查禁政策，也是屡见不鲜的。据台湾报纸披露，从1950年至1987年间，台湾共查禁的图书累计达4000本。其中，有大陆出版的新文学书刊，有鲁迅、茅盾、夏衍、冰心、巴金、老舍、郁达夫、沈从文、钱钟书等人的作品，也有台湾作家雷震、柏杨等人的作品。这种查禁，当然是出自政治上的目的。现在上述禁令虽已解除，但色情方面和“台独”方面的书刊，仍属查禁之列。

① 参见1991年《环球》第2期夏鼐撰写的文章。

从以上事实不难看出，否认文化艺术政策的客观存在和必要性，主张文艺的无目的性或“文艺并不为什么服务”，“既不提倡什么，也不禁止什么”，其实是对文艺属性和它与政治的关系的严重误解。前些年，一些人激烈反对我国文艺的革命功利主义，有的显然是对世界文化艺术发展史缺乏全面的认识 and 了解，有的则是在总结过去文艺工作的失误时，以主观猜想代替客观事实。比如，有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集团”对文艺提要求是出于对自己“曾有过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业绩”有“特殊的感情”，说什么我国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打一起步，就“沾染着浓重的功利色彩”，“先天就患着贫弱症”。这样总结过去的“失误”，不仅会把坚持文艺正确方向同革命文艺在一定发展时期出现的片面性混为一谈，而且还会最终导致对文艺政策的怀疑和否定。生活在现代社会之中，而又幻想着文艺问题上的无序和自流，是根本不现实的。

三、文艺政策与政治路线

要认识一种文艺政策，必须首先了解与之相关的政治路线。因为任何一种文艺政策都是根据一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制定的。对于有着高度自觉意识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尤其是如此。因此，从总体上说，文艺政策与政治路线的关系，是局部与整体、被统属与统属的关系。

在马克思恩格斯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文艺的主要接受者并不是劳动群众。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出发，对文艺提出了社会主义倾向的原则要求，也就是要求文艺作品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打破人们关于这些关系的传统思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们对于现存事物永世长存的怀疑。与此同时，他们还热情鼓励作家创作直接反映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反抗旧世界、争取做新世界主人的作品，并认为这样的作品应该在现实主义领域中占有重

要地位。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代，列宁便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写作事业“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毛泽东同志在制定党的文艺政策时，进一步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这种革命的文艺观，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始终站在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高度，去关照整个文艺工作，对文艺工作提出了符合实际的具体要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在“结论”部分，又对“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作了具体阐述，提出了文艺“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著名观点。^①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一直是从文艺工作与党的政治路线的联系上，引导我们制定、了解和执行党的文艺路线和方针政策。

但是，有许多同志往往忘记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与总路线和总政策的联系。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又指出：“如果真正忘记了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②因此，我们在深入认识党和国家现行文艺政策之前，首先要充分注意党在今天的政治路线。

党在今天的政治路线，就是党的十三大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是以经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4页，第3卷第847、86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6页。

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实现一个总目标。其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改革开放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方针、总政策。新时期文艺政策的调整和发展，几乎是与上述政治路线的形成同时进行的。没有上述政治路线的制定，就不可能有文艺政策的调整和发展。

既然新时期的文艺政策是根据党在当前的政治路线制定的，我们在认识和执行时，就不能脱离这条政治路线去作孤立的理解。文艺工作者应该自觉地以对这个总任务和总目标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既然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时代的主要课题，是时代的总要求，文艺创作就应当努力去实现它，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人们对它的理解和追求。

过去，在处理文艺政策与其他革命工作的关系上，我们有过一些失误，需要认真总结。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经把文艺政策与总路线、总政策的关系，理解为文艺创作同各种具体政策的结合，一般地去配合政策，为政策服务。当时认为，“政治的具体表现就是政策”。应该说，要求党员作家站在党的政策的立场上，用政策的观点去认识现实，分析现实，这是对的。但如果要求全部文艺去和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相结合，就会影响文艺的正常发展。重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本来是我国的一种传统。儒家的“乐论”、“诗论”和“诗教”，都是很好的例证。但当时还主要不是对创作的要求，而是立足于如何利用已有的文艺，如何从文艺作品中反观社会人心和政治上的得失。《礼记·乐记》讲的“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就是讲的政治上的治与乱是如何在音乐上反映出来的。人类社会早期的文艺活动，还没有主动与政治相结合的自觉意识。现在，文艺主动与政治结合，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当然，这种结合，只能是在大方向上的结合，同总的政治路线的结合，而不能强求它去同具体的各种政